

亚非学会和中东学会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沙米尔重新上台及其推行的内外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王维周

今年3月中旬，由于以色列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致使以利库集团领袖伊扎克·沙米尔为总理的以色列第23届政府宣告垮台。随后，两大党围绕着组阁问题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烈争斗，最后沙米尔终于在议会以2票的微弱多数被授权重新组织了一个由他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这次政府危机和重新组阁的艰难过程不仅反映了两党斗争的激化，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以色列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和矛盾重重的尴尬处境。而沙米尔的再次上台及其宣布的内外政策则反映了以色列统治集团右派极端势力在政府中占了统治地位，它必将对以色列政局和中东形势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一、史无前例的政府危机

1、两党联合政府频频发生危机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曾发生多次危机，但本届政府危机是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984年两党第一次联合组阁期间就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它们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后来虽勉强联合组阁，但仍然貌合神离。1988年11月议会选举中，两党由于在人民中的威信下降，结果都分别只获得议会席位的大约1/3，离法定的组阁起码席位61席相差甚远，致使两党都无法独自组阁。后经过双方反复磋商，互相妥协，才再度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此后一年多时间内，该政府因政治分歧和争权夺利而不断发生争吵。在此次政府倒台前，已出现过两次内阁危机。1989年7月，利库德集团内以主席阿里尔·沙龙为首的极端派对沙米尔的“和平”计划（即在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中进行选举的计划）提出了“修正案”，主要内容是“计划”要明确阐明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没有资格以代表身份参加选举占领区的代表同以色列谈判；占领区在进行选举前必须停止起义；“计划”必须明确不准成立巴勒斯坦国，不同巴解组织谈判。工党对此激烈反对，并敦促沙米尔不要接受“修正案”，否则工党就要退出联合政府。沙米尔为了争取人心，需要继续维持与工党的联合执政局面，只得重申原计划有效，从

而使这次政府危机暂告缓释。1999年年底至今年初，沙米尔指控政府科学和发展部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级官员进行接触不符合两党组阁的协议，并随即解除了魏茨曼部长职务。这明显是借故要挟工党。工党领袖、政府副总理西蒙·佩雷斯坚决反对沙米尔解除魏茨曼的职务，并反唇相讥，说沙米尔一伙实际也同巴解组织一直有所接触。佩雷斯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一定要解除该部长职务，工党全部部长就退出内阁另组新政府。在这样的压力下，沙米尔才改变初衷。经过磋商，两党达成协议，魏茨曼继任部长职务，但退出12人的核心内阁。联合政府虽然度过了这次危机，但实际上两党的矛盾日趋尖锐。

在中东和谈问题上，利库德集团宣布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巴以会谈的贝克计划。今年2月22日，工党就此对利库德集团发出警告说，如果对方在三周内仍不接受这一计划，那么工党就要退出联合政府。3月11日，工党要求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就贝克计划进行表决，当场遭到沙米尔的拒绝，于是佩雷斯就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声言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但沙米尔却抢先一步，于13日宣布解除佩雷斯副总理职务，于是，佩雷斯率领全部工党部长辞职。至此，成立了15个月的两党联合政府彻底垮台。3月15日，议会以60票对55票的多数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这样，沙米尔就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位被议会赶下台的总理。

2、议会各党在组阁问题上的新角逐

沙米尔政府垮台后，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在组阁问题上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角逐。双方互相排斥，互挖墙脚，各不相让。先是以色列总统、工党成员赫尔佐克在3月20日授权佩雷斯组阁。当时，佩雷斯自以为是，信心十足，立即在一些宗教政党和小党中大力游说，积极拉拢，争取同它们结盟，以图组成一个以工党为主的新的联合政府。眼看事情即将告成，岂料原站在工党一边的以色列正教党两名议员突然弃权，致使佩雷斯²⁴在限定的时间(21)天内第一次组阁失败。但佩雷斯并不甘心失败，在总统获准后，又在延长的两周内继续努力拼凑组阁，但终因不能凑足法定多数而只能含

慢放弃组阁权。据报道，由总统选定的议会大党候选人组阁遭到失败，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首开记录。佩雷斯两次组阁未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没有看到在过去执政期间政绩平平，工党声誉不佳，加之内部派系斗争、特别是佩雷斯与另一工党领导人，原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之间的矛盾，已使工党在人民群众中缺乏号召力；二是议会的小党大都对工党存有戒心，在关键时刻，由于利库德集团的拉拢以色列正教党背弃诺言，反戈支持利库德集团，致使佩雷斯组阁失败。

4月26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转而要求沙米尔重新组建新政府。但沙米尔同样面临重重困难，在三周限期过去后，沙米尔面临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也未能完成组阁使命。在后来延期的三周中，沙米尔费尽心机，竭尽封官许愿，收买拉拢之能事，最后才勉强凑起一个联合政府。

3、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

以色列政府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两党对贝克计划所持的不同态度，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以色列国内外多方面的深刻矛盾，包括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即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以及以色列当局和美国政府的矛盾。

首先，政府危机反映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利库德集团和工党长期以来存在政治分歧，主要是如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当前如何推进中东和谈。以佩雷斯为首的工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主张接受贝克计划，同巴勒斯坦人对话，并愿“以领土换和平”的原则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但沙米尔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他们拒绝接受贝克计划，拒绝同巴解组织谈判，反对召开中东国际和会，主张永久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外，两党还互相争权夺利，这也是导致内阁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二，由于巴解组织近几年来为打破和谈僵局，采取了一系列灵活主动姿态，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让步，包括主动承认以色列

的存在。巴解立场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国已得到世界上104个国家的承认。与此同时，持续了两年多的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也给以色列更沉重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人民的和平呼声日高，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政府同巴解直接对话。今年1月，一项对1000名犹太人的民意测验表明，63%的以色列人希望政府同巴解对话。人民的压力也是促成两党分裂导致政府危机的一个原因。

第三，以色列是个实行议会制的国家，议会选举制度对政府危机的持续也起一定作用。以色列议会共120个席位，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分别占39席和40席，其他13个党派分占41席。这些党派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相比，虽然势单力薄，但在议会表决中却掌握关键的票数，成为左右议会天平的砝码。两大党想要单独组阁，都必须获取小党支持。而各个小党派也乘机抬高自己的身价，有的要大党调整自己的政策作为支持他们组阁的条件；有的则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以达到它们参政的目的。加此次沙米尔新政府组成过程中，为了争取利库德集团的组阁权，对9个右翼小党和宗教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获得了它们的支持，得以拼凑议会的61席而组阁。而这些小党中，有5个政党党员任政府职务，其中4个小党的5名成员担任了部长，另外2名成员任副部长，基本上做到了各有所得，从而使这笔交易获得成功。

第四，美国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政府危机有直接影响。布什上台后，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出发，对中东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其中包括同巴解组织直接对话，并希望以色列政府也同巴解对话。由于以色列的选举计划遭到巴解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故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提出一项巴以对话的折衷建议。尽管此建议已充分照顾以色列的利益，但沙米尔还是拒绝接受，因而使美国政府十分恼火。今年4月，沙米尔访美后，在耶路撒冷叫嚷“需要建立一个‘大以色列’来安置苏联犹太移民”。布什随即发表讲话，公开抨击沙米尔“大以色列”论调，反对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定居。美国议员还威胁减少对以经济援助来抑制以色列向占领

区的移民计划。贝克公开警告沙米尔不履行以外长阿伦斯在巴以会谈问题上的承诺。工党领袖佩雷斯就是利用美国同沙米尔的矛盾，才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的中东和谈计划，配合美国向沙米尔施加压力，直到把他搞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人在加速这个政府崩溃的过程中是帮了忙的”。

二、沙米尔新政府的特点

今年6月11日，以色列正式组成以伊扎克·沙米尔为总理，包括其他18名部长的新政府（亦称第24届政府）。据各方报道分析，该政府的主要特点是：

1、由利库德集团和一些极右小党和宗教党组成，工党没有参加本届内阁。各党派领导人经过同沙米尔等人反复磋商，讨价还价后，在本届政府中的各部长分配情况是：利库德集团共12名，即总理，副总理（2名）、国防部长、运输部长、经济和计划部长、司法部长、警察部长、财政部长、卫生部长、旅游部长、建设和住房部长；两个右翼政党即佐米德党和塔西亚党共2名，分别为农业部长、科学发展和能源及基本建设部长；两个宗教党即沙斯党和全国宗教党共5名，分别为：内政部长、移民安置部长、交通部长、以及教育和文化部长、宗教事务部长。另处，德加尔哈托拉党的2名党员担任教育与文化部长和财政部的副部长。而工党则完全被排斥在外，这是自1984年以来，利库德集团第一次在组阁问题上同工党分道扬镳，自行其事。

2、集中了右翼强硬派代表人物。沙米尔出任总理，他一贯以推行右派路线而著称。上届政府副总理兼建设和住房部长戴维·利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代表北非犹太人利益，因反对中东和谈而得到沙米尔的赏识。上届政府外交部长摩西·阿伦斯改任国防部长，他是沙米尔路线的主要推行者。他上台伊始，就主张进一步动用军队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上届政府工业和贸易部长阿里尔·沙龙任建设和住房部长，他是1982年策动以色列军队大举入侵黎巴嫩的罪魁祸首之一。上届政府经济和计划部长伊扎克·穆达伊任财政部长，他是和沙龙等人一起对沙米尔“和平”

计划提出“修正案”的右派人物之一。摩西·尼辛任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长，他是沙米尔的密友。沙米尔希望他出任现职后，能在今后的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上层政府环卫部长罗尼·米洛出任警察部长，他也是沙米尔的密友。他上台后表示反对贝克对巴以对话所作的努力。以上7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以色列出名的右翼人物。据此，西方观察家认为，本届政府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之一。

3、不设核心内阁，但却有一个以总理为首，包括另外10名委员的国防委员会，其大部委员为利库德集团成员，主要负责安全问题的重大决策等工作。委员会由沙米尔任主席，委员有戴维·利维、摩西·阿伦斯、阿里尔·沙龙、伊扎克·莫达伊、罗尼·米洛、拉菲尔·艾坦等人。据说政府有两个“厨房内阁”。一个是由戴维·利维、阿里尔·沙龙和伊扎克·莫达伊等3名“厨师”组成；另一个由摩西·尼辛、摩西·阿伦斯以及丹·梅里多、罗尼·米洛及耶呼德·奥尔默特等组成。沙米尔本人必须经常同这两个“厨房内阁”进行磋商，以保证其政府政策的贯彻执行。很明显，前者是几个思想比较更右的部长。后者都是沙米尔的一些亲信或者是同他站在一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两个“厨房内阁”的矛盾和斗争会逐步体现出来。

三、沙米尔新政府的内外政策

据各方报道分析，沙米尔新政府成立以来的内外政策已见端倪，现择要评述如下。

(一)对外推行敌视阿拉伯人的政策，兜售在被占领土实行“选举”与“自治”的计划。

1.把移民安置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扩大在被占领土的犹太定居点。

沙米尔新政府的《施政纲要》中说，“本政府将把移民和安置放在民族目标的首位”，“将采取行动加速从世界各地的移民并拯救所有受迫害的犹太人”。沙米尔本人宣布，他的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大量接受和安置苏联犹太移民，绝不错过这样的历史机遇。”据报道，自今年1月到8月，已有约10万苏联犹太人移居

以色列。据以色列移民和安置部长伊扎克·佩雷茨最近宣布，今年全年将有25万苏联犹太移民来到以色列。今后5年中，将有75—100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这些苏联犹太移民中，教授、工程师以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很多，因而他们既是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和难得的技术力量，又是一支重要的国防后备力量。这对以色列巩固“安全边界”、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和发展经济都有重大意义。

沙米尔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宣称，“在以色列所有的地方定居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国家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采取行动加强定居点，扩大和发展定居点。”现在以色列在占领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已设立130多个犹太人定居点，计划再新建一批。据报道，这些定居点一般都设在高处，占据有利地形，并有公路和专用通讯设备与以色列有关当局密切联系，用以严密监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提供他们行动的早期警报，以便及时进行镇压。建设和住房部长沙龙直接负责安置外国犹太移民。沙龙就职后的第一天就说：“政府无权指示人民到哪里居住”，意思是苏联犹太移民移居被占领土，旁人无权干涉。

2、扩军备战，进一步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

新政府《施政纲要》中说：“将努力增强以色列国防军的实力、威慑力量”以“抵御外来威胁”。以军现有常备军14万人，经紧急动员后，即可达60多万人，已配备各种现代化的武器，据说还拥有制造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能力。这支部队的机动性、突击性能力较强，过去五次中东战争中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严重破坏，今后仍是对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威胁。

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强调，要“根除”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沙米尔本人则表示将以“决定性”的方式镇压起义，强调要把“接受巴解组织指令的挑唆者和恐怖主义分子孤立起来”。国防部长阿伦斯就职之后，立即同以军高级军官磋商如何镇压起义、农业部长埃坦（前以军总参谋长，此次经沙米尔提议进入国防委员会）曾建议将更多的起义分子驱逐出占领土地。

3、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坚持“三不政策”和“选举”及“自治”计划。

新政府《施政纲要》中说，“将全面贯彻……1989年5月的和平建议”，“反对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及约旦河之间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不同巴解组织谈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简言之，就是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即坚决不承认巴解组织，坚决拒绝与巴解组织谈判，坚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外长戴维·利维最近还要求美国作出保证，在美国建议的和平谈判中，以色列将不同巴解组织对话，也不讨论与选举无关的问题。

4、维持和美国的战略联盟，发展与中苏关系。

新政府表示“将继续保持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现有的友谊，并将努力在各领域加强这种关系，包括战略合作。”以便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继续与阿拉伯世界抗衡。其次，利用目前苏联和东欧急剧变化的形势，表示要同苏联和东欧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以便从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渔利。再次，对中国表示友好，要继续同中国发展各种关系，直至建立外交关系，等等。

(二)对内力图安定人心，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

1、采取措施，保持经济稳定。

过去几年中，由于以色列当局镇压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加之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使以色列经济近两年来连续处于萧条状态。国内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目前的失业率已达10%，失业人数10多万。通货膨胀率一直是两位数，最高年通货膨胀率达20%以上。人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怨声载道。为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新政府的《施政纲要》表示要“保持经济稳定，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失业”，“改变经济结构”等等。为保证上述政策的实现，以色列政府将采取削减公共消费，鼓励储蓄，实行市场和税收改革，加速国有公司私有化等等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完见效，还有待实践证明。

2、标榜扩大民主，进行选举改革。

较长时期以来，利库德集团和工党轮流或联合执政，对外一直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和阶级压迫，种族歧视现象日益严重，使下层犹太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备受欺压，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另外，一些小党派对两大党独揽大权表示不满，要求参政的呼声日高，它们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支持。新政府《施政纲要》中也不得不表示要“加强国家民主”，创造条件来进行政府改革和选举，同时，要求“培育相互容忍，把国家各部分团结在一起”，还表示要“采取行动，实行地方政府的改革。”以此来安慰人心，保持统治。

3、力图维持社会秩序安定。

连年来，由于以色列政府倒行逆施的政策，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不能得到较快改善，人们对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以致犯罪和吸毒现象日趋严重，成为各届政府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赢得人民支持，新政府《施政纲要》中表示，要“根除犯罪和暴力”，“增强……与犯罪作斗争的能力”，“与危险的吸毒现象作斗争。”等等。但要实际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

自从沙米尔新政府成立以来的形势发展表明：在以色列国内这次政府危机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时难以完全消除。两大党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大党和小党之间纵横捭阖的斗争仍将继续发展，各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也将有增无已。由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日趋高涨和国内政治经济困难重重，国内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内讧已十分厌恶。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正越来越高涨，以色列政局仍将动荡不定。

在国际上，虽然由于海湾危机暂时使阿以矛盾退居次要位置，但这一根本矛盾是不易解决的。目前中东和谈越起不前，而沙米尔新政府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的极端路线仍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同巴解组织、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要求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阿以争端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沙米尔新政府在国内外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果它坚持僵硬立场和既定政策，它必将遇到更多的困难。

继亚洲“四条小龙”之后，泰国的经济也开始起飞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泰国的经济已步入黄金时期，为此而创造的一些新名词也不时见诸报端。如有人称泰国为“新兴农业工业国”；有人预测“新兴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下一个成员非泰莫属”；有人将近来泰国的经济发展誉为“湄南河畔的奇葩”；有人推测泰国将成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等等。可见泰国的经济发展这一静悄悄的、开始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变化，目前已经变得有声有色，为世界所瞩目。泰国是我们的近邻，具体国情诸多又与我国有相似之处，故介绍泰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泰国现代化运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

泰国的现代化运动在亚洲国家中起步较早，迄今为止已有一个多世纪，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面对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挑战，拉玛五世国王（1853—1910）为了自强图存，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改革，史称“拉玛五世改革运动”。

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领域，如废除奴隶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制度、税务制度、军事制度、交通运输和市政建设等。改革推动了泰国社会生

— / —

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通过改革也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在民族工业发展和产业工人增加的同时，农业开始商品化。由于改革打击了封建地方割据势力，因此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国力增强，使处于殖民主义掠夺夹缝中的泰国，最终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地位。

拉玛五世国王还两次亲赴欧洲考察，并派出许多青年赴欧留学，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在政府里担任顾问等职。通过上述改革，使泰国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奠定了现代泰国立国的基础。因此，笔者以为把拉玛五世执政的42年间（1868—1910）看成是泰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阶段，也许是适宜的。

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自拉玛五世开始起步的泰国现代化运动不是“内发型”的，也是由一种外力促逼而成的“外发型”。即为了应付外来威胁和求得自身生存，由此而来的局限性也是明显不过的。如对在非进行改革不可的地方尽可能地维护旧制度使其不受影响，在权力结构方面更是千方百计维护原状。但是既然已经开始迈步，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自本世纪初起，在泰国社会的内部，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行为模式，现代化的范畴在不断扩大，现代化的影响和力量在日渐加深。

二、缓慢渐进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泰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战后加速了泰国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两次大战期间，泰国实行亲日政策，并于1942年1月向英美两国宣战。这一特殊情况使泰国在两次大战中，并没有受到象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严重的战争破坏，故战后复兴经济的负担也并不那么严重。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发展策略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工业化着手，以工业化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并由此来带动充分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落后技术结构，逐步建立起一个均衡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泰国也受这一发展战略影响，选择了从工业化入手的经济发展战略。

1953—1954年泰国的外汇收支危机导致颁布“1954年鼓励工业发展法案”，这是泰国政府实施以工业化为中心发展战略的开端。这一工业化政策的特点是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办工业，以此进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阶段。为此在五十年代建立了100多家国家企业，包括纺织、水泥、钢铁、陶瓷等。但是这些企业后来成为某些官僚积累资本和聚敛财富的场所，并利用手中特权垄断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导致低效率和连年亏损，反而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加上还实现了限制泰国华人经济活动的政策，故这一阶段泰国的工业化进展迟缓，成效不大。

③新起点阶段。从六十年代开始是泰国现代化运动的新起点，主要标志为一个“计划”和一个“法案”。计划是指从1961年起泰国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1961—1966）；法案是指1960年颁布了一个鼓励工业投资的法案。由此，泰国学者那隆猜·阿德拉沙尼指出，泰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是从1960年开始的。(1)

“1960年鼓励工业投资法案”的实施，使民间资本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政策走上了正轨，也为泰国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法案实施的结果是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到1964年时，在总额约为4亿美元海外投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政府企业，其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约占86%。(2)

企业从国营转变为民营的好处和必要性在哪里呢？其一为纵观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通常是导致官僚资本垄断、企业低效率和经营管理不善的根源，也是企业职工滋生惰性和企业管理官员腐败的温床。其二为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企业的成功中给予人们（包括管理人员和工人）更多的份额，使所有从事工作的员工从自己企业的效率和成功中得到一定的利益，因而就会奋发工作，增加责任感。可以说，民营企业兼顾了公平和效益这两个目标，因而已成为一种世界发展趋势。泰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着重为民营资本投资创造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各种优惠条件的政策，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在现代化运动中不失为是成功之举，因而对某些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这一法案的实施，使私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如1956年新注册的私营企业只有977家，到1957年时，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增加到7693家。⁽³⁾在私营企业增多的同时，国营企业在减少，结果仅保留了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如铁路、自来水、电力、邮电以及烟、酒等专卖机构和旅游业等。泰国较大的国营企业从七十年代的105家减少到八十年代的70多家，并且基本上保持了这一数目。总起来说，六十年代成为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起点，诚如日本学者粕谷雄二指出的那样，“泰国的经济开发战略是从根据1960年所制订的‘工业投资奖励法案’和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所规定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开端的”。⁽⁴⁾

四、起飞阶段。从1971年10月开始实施的第三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提出了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指导方针。通过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扩大发展出口的贸易，促进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出口

的多样化，从而完成泰国在总体上由进口替代到面向出口替代的战略转变。这一战略的实施也很快奏效，如工业制品的出口比重从1970年的5.4%增加到1980年的28.8%，整个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60年—1970年期间的5.5%提高到1970—1975年期间的9.1%和1975—1980年期间的14.4%。(5)

进入八十年代后泰国经济的发展战略虽然仍以工业化为中心，促使经济持续增长，但在继续发展面向出口工业的同时，注意调整工业和农业、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平衡关系，使之协调发展。如在八十年代初确定了“农业工业化”的发展计划，以农产品出口多样化，初级产品深加工为重点，扩大出口创汇，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泰国这一以工业化为主，重视农业发展，“以工养农”的“农业工业化”战略取得了成功，为此被称为是找到了一条走“农产品资源深加工立国”的道路。

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使泰国工业化程度提高，如工业产品出口有很大发展，1960年时制造业产品只占出口贸易的2.4%，1980年时已达40%，1987年已提高到62.5%。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扩大到出口总额的50%标准时，已成为新兴工业国家了，泰国已连续二年超过了50%，这一变化颇为引人注目。目前泰国的出口增长居亚洲之首，如1986年比1985年增加了39.5%，1987年又比1986年增加了42.5%，1988年的出口创汇估计将要首次突破3000亿铢大关。(6)

这一阶段的经济起飞，从泰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如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36亿铢，1975年增加到298亿

铢，增加了近120%，1980年增加到684亿铢，比1975年增加了近130%，1985年增加到1041亿铢，比1980年增加了近80%，1986年增加到1098亿铢。由此可见，从1970年至今，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每五年翻一番。⁽⁷⁾这一发展速度在亚太地区国家中是少见的，对此，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承认：在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⁸⁾

泰国的人均国民收入1961年时不到100美元，1986年为759美元，（一说是810美元），目前已达9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1980年规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10美元为中等国家的收入标准，泰国则早在七十年代就达到了。

鉴于为数已经不很多的泰国国营企业“在1986年仍然亏损了8千多万美元”⁽⁹⁾，以及在从官办变民办，国营变民营的战略实施中找到了发展动力，所以目前正在实施的第六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987—1991）中，规定民营企业继续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如在占投资总额（660亿美元）的70%由民营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而国营企业的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¹⁰⁾泰国政府将继续为私有化提供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并以此来进一步解放社会潜在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二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进程。根据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表明，现代化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马克思·韦伯认为，从传

统到现代，就是从个人权威到多数民主，从农业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进程是理性化的结果，具体表现在：(1)制度化，讲求法律秩序；(2)讲求效率；(3)知识、技术、职业专门化；(4)对传统采取批评态度；(5)建立真理的标准。⁽¹⁾上述各个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关联，互相影响，是一个有机的进程。

对于一个正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方面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具体来说是要选择民主政治，政治领域对所有的公民和利益集团开放，而不能成为知识界、政界、军界或某一方面杰出人物享有的一种特权。发展政党、利益集团、普选权以及选举、公民投票和罢免程序，容许个人竞争和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等，既是民主政体的起码要求，也是国家的“安全阀”。除此以外，还必须使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为只有群众动员和参与政治，而无相应程序的“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不仅不能造成政治的发展，有时还会带来政治衰退。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泰国原先是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影响极其深厚，如长期军人独裁，政变频繁，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等，因此实现政治民主化至关重要。在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泰国的政治发展作出了有利于经济体制的选择，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拉玛一世国王于1782年创建的曼谷王朝，延续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由世袭产生的王权至今仍享有传统的合法性。泰国是个君主立宪国家，国王为国家的元首，也是国家团结一致的象征，国王对于全国政治的稳定和逐步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受到全国人民的效忠和敬仰，在泰国到处可看到国王的肖像。